

宗教改革的先驱 ——施道比茨及其与马丁·路德的思想比较

孟 阳

(德国明斯特大学新教神学院)

摘要：作为马丁·路德的导师和忏悔神父，施道比茨对路德的生活和思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施道比茨对于时代和历史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马丁·路德而已。在思想层面，作为一名改革思想家，同时也是圣经学者和牧师，施道比茨以布道的方式重新诠释了保罗和奥古斯丁的神学，通过对上帝的甜蜜，基督作为中保，唯独恩典等思想的强调，他为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现实层面，作为奥古斯丁修道会改革派的代理主教，施道比茨曾发起过改革派与非改革派间的整合运动；而作为维登贝格大学的创始人及初代神学院院长，施道比茨不仅为这所学校招揽了众多优秀的教授和学生，同时也奠定了这所大学的人文主义和教父神学的基调。

关键词：施道比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作者：孟阳，明斯特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专业，博士一年级，通讯方式：myang2@uni-muenster.de；<https://orcid.org/0009-0007-8916-1538>；电话：15501152265。

导 言

约翰·冯·施道比茨（Johann von Staupitz），约出生于 1463-1468 年，卒于 1525 年，是著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导师和忏悔神父。曾担任过奥古斯丁修道院代理院长（1503-1520），萨克森教省省长（1509-1512），维登贝格大学教授及神学院院长（1502-1512），以及圣本笃会修道院院长（1522-1524）等职务。

作为一名具有改革思想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施道比茨的教导以教父（尤其是奥古斯丁）和圣经为主。他采取了修道院神学（monastic theological）的神秘主义方式来对圣经进行研究，强调圣经的属灵意

义。¹ 因而，他讲经布道的主要目的便是通过圣经来抚慰和启发人的心灵。与此同时，作为德国改革派的代理主教以及维登贝格大学的神学院院长，历史也赋予了施道比茨实践其思想的机会。²

尽管施道比茨对于马丁·路德以及宗教改革的影响巨大，但由于路德的关系，人们过去常常会忽略他。事实上，这一现象不独在汉语学界，即使是英语乃至德语世界，关于施道比茨的研究和资料都相当不足。本文将对施道比茨的生平和其主要思想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其思想与路德之间的异同，以及他本人的历史影响。以此，希望汉语学界能在将来给予这位改革先驱以更多的关注。

一、对施道比茨的相关研究

任何对施道比茨的研究都离不开对马丁·路德的讨论。这也是早期对施道比茨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即，只是将施道比茨作为路德研究的附庸来看待。阿尔弗雷德（Alfred）的《约翰·施道比茨：路德的父亲和学生——他的生活，与路德的关系，及其著作精选》³ 大概是最早的关于施道比茨的传记性作品。而1971年出版的沃尔夫的《施道比茨与路德》⁴ 是早期探讨路德与施道比茨关系的一部扛鼎之作，对后世影响颇大。另一位重要的学者是海科·奥伯曼，作为宗教改革和晚期中世纪研究的专家，他也对施道比茨进行过大量研究。在其代表作《路德：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人》中，奥伯曼称施道比茨为早期宗教改革中的关键人物，⁵ 并花了大量篇幅对施道比茨和路德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神秘主义方面对路德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考证。在其《宗教改革先驱：晚期中世纪思想的形成》⁶ 中，奥伯曼还选译了施道比茨1516年在纽伦堡的四旬期布道集。此外还有凯勒，他从史料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施道比茨与宗教改革之间的渊源。⁷ 近年来，德语世界关于施道比茨的研究还有韦策尔和多纳。他们在《施道比茨：路德的神学老师》⁸ 一书中进一步讨论了施道比茨关于律法与福音的思考，并对自1979年至2016年间发布的施道比茨研究进行了述评和总结。

英语学界对施道比茨的研究远不如德语学界丰富。主要包括四种类型，一是在研究路德时顺带提及施道比茨，如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⁹ 斯考特的《远见的改革者——马丁·路德》¹⁰ 等。二是对德

1 David C. Steinmetz, "Hermeneutic and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in Staupitz and the Young Martin Luther,"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70, (1979), 24-58;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London: Routledge, 2003), 256.

2 如路德所说，“施道比茨是三十多所修道院的代牧……他是一个在他的修道院中恢复圣经研究的人。”见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31.

3 Jeremias, *Johannes von Staupitz. Luthers Vater und Schüler. Sein Leben, sein Verhältnis zu Luther und eine Auswahl aus seinen Schriften*, ed. by Alfred, (Hochweg, 1926).

4 Ernst Wolf, *Staupitz und Luther: ein Beitrag zur theologie des Johannes von Staupitz und deren bedeutung für Luthers theologischen werdegang*, (New Brunswick: Johnson, 1971).

5 Oberman, Heiko A., trans. Eileen Walliser-Schwarzbart. *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5.

6 Oberman, Heiko A., *Forerunners of the Reformation*, tr. by Paulus L. Nyhus, (Cambridge: James Clarke Lutterworth, 2002).

7 Ludwig Keller, *Johann Von Staupitz Und Die Anfänge Der Reformation: Nach Den Quellen Dargestellt*, (London: Forgotten Books, 2018).

8 Richard Wetzell, *Lothar Graf zu Dohna, Staupitz, theologischer Lehrer Luthers*,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18).

9 Roland H. Bainton,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 (New York: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9).

10 Scott H. Hendrix, *Martin Luther Visionary Refor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语著作的翻译，如马克瓦尔德与鲁道夫的《神秘的受难：约翰·冯·施道比茨在他〈1520年四旬期布道集〉中的精神性》。¹¹其中在导言部分，作者讨论了施道比茨的属灵精神（spirituality）的本质以及他在晚期中世纪的位置。三是在有关中世纪思想史的研究中，单独讨论施道比茨对于晚期中世纪神学或宗教改革的作用。如萨克（2002）在其《通往天堂之路》中，通过分析路德与施道比茨的书信，探讨了奥古斯丁修道会对于路德神学的重要性。¹²威克斯在其编辑的《宗教改革中的保罗的同道者》¹³中探讨了保罗在施道比茨布道集中的体现和影响。他指出，通过对保罗主要书信的诠释，施道比茨将人自身的罪与基督中的上帝恩典间的斗争进行了内化。这点使施道比茨得以区别于当时流行的依赖圣物、赎罪券等外在仪式的宗教崇拜。此外，巴斯特则从晚期中世纪城市布道者的身份出发探讨了施道比茨对于宗教改革的影响。¹⁴四是对施道比茨本人的专门研究。如马克瓦尔德和珀斯特以时间为轴，对1867–1995年间的119篇施道比茨相关研究论文及专著进行了编目和简注。¹⁵因而本书可以与上述韦策尔的著作相配合，做为施道比茨研究的书目指南。

此外，近代有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专门进行施道比茨研究的学者。一是奥伯曼的学生，施泰因梅茨（David C. Steinmetz）。他于《幕后的改革者：从盖勒·冯·凯瑟斯堡到西奥多·贝扎》¹⁶一书中为施道比茨单列一章，强调了他的救赎论和命定论（predestination）思想，并在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上，指出了他对路德的重要影响。同年，在其《晚期中世纪背景下的约翰·冯·施道比茨的神学》一书中，施泰因梅茨将施道比茨置于晚期中世纪的背景下，进一步探讨了施道比茨与保罗、奥古斯丁、唯名论、阿奎那等人在思想上的联系。¹⁷根据施泰因梅茨的观点，施道比茨是一个晚期中世纪奥古斯丁主义者的代表性人物。这意味着，他的作用不仅仅是启发路德，而且也体现了晚期中世纪天主教会内部以及神学改革的努力。在路德与施道比茨的关系上，施泰因梅茨指出，在施道比茨晚年，两人的实际角色发生了调换，即，施道比茨成了路德的学生，而路德反成为导师。但是尽管如此，施道比茨从始至终都不能算是一个路德宗的新教徒。

二是美国独立学者珀斯特（Franz Posset），他的《天主教改革的领跑人：约翰·冯·施道比茨的》一书，在详细考证施道比茨生平的同时也具体考察了他的几部重要布道集中的思想。¹⁸在他看来，施泰因梅茨将施道比茨称为幕后改革者的研究，低估了施道比茨对路德，以及他本人的历史影响。珀斯特指出，施道比茨不仅仅是新教改革的先驱，事实上，直到15世纪20年代，在天主教改革和新教改革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分。而施道比茨本人，实际上是这一整体的改革运动的领跑人。

除著述外，另一项施道比茨研究的重点当然是关于他本人著作的整理。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他的布道集。施道比茨最早的布道集作品为1497–98年间的图宾根布道集。而其最后一部《关于神圣的基

11 Rudolf K. Markwald, *A Mystic's Passion: The Spiritualit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his 1520 Lenten Sermons,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Bern, Frankfurt am Main and Paris, 1990).

12 Erik L. Saak, *High Way to Heaven: The Augustinian Platform between Reform and Reformation, 1292–1524*, (Netherlands: Brill Academic Pub, 2002).

13 Jared Wicks, *A Companion to Paulos in the Reformation*, (Netherlands: Brill Academic Pub, 2009).

14 Robert J. Bast, ed., *The Reformation of Faith in the Context of Late Medieval Theology and Piety*, (Leiden: Brill, 2004).

15 Rudolf K. Markwald & Franz Posset, *125 Years of Staupitz Research (Since 1867):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on Johannes von Staupitz (c. 1468-1524)*, (Center for Reformation Research, 1995).

16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18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基督教信仰》(Von dem heyligen rechten Christlichen glauben) 则出版于 1525 年, 是在其去世后由文策斯劳斯·林克(Wenceslaus·Linck) 帮之整理出版的。其中, 除图宾根布道集外, 其他大部分布道集都是由听众记录的手稿整理而成。其二则是施道比茨与路德、林克等亲友的书信。

1867 年, 克纳凯(J. K. F. Knaake) 一次试图完整地施道比茨的全部作品进行整理出版, 然而该集实际上只出版了一卷, 即, 只收录了施道比茨的德语著作。¹⁹其中包括: (1) 《关于仿效耶稣基督之死》(1515) (*De imitanda morte Jesu Christi libellus*); (2) 《1517 年纽伦堡布道集》; (3) 《关于永恒预定的执行》(1517) (*Libellus de exsecutione eternae praedestinationis*); (4) 《关于上帝之爱》(1518) (*De amore dei libellus*); (5) 《关于神圣的基督信仰》, (1524 年) (*De sancta fide Christiana libellus*)。

1979 年, 多纳与理查德等人开始整理出版《约翰·冯·施道比茨全集》²⁰, 截至目前, 该集只出版了 1、2、5 卷。内容包括图宾根布道集, 《关于永恒预定的执行》在内的几本小册子, 以及一些由施道比茨制定的章程等(Gutachten und Satzungen)。此外, 他的 1512 年萨尔茨堡布道集以独立形式出版。

二、施道比茨的主要人生经历

2.1 早年求学

施道比茨出身于德国撒克逊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其童年在姆特维茨(Mutterwitz) 度过, 这是一个靠近格里马(Grimma) 和迈森(Meißen) 的小县城。他的童年好友兼同窗之一是未来的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二人都曾就读于格里玛当地的贵族学校。

1483 年 5 月, 施道比茨进入科隆大学, 一年后获得该校文学学士学位。1485 年, 在莱比锡大学度过了一个学期后又回到科隆大学, 并于 1489 年夏获得该校文学硕士学位。同年 10 月, 加入莱比锡大学文学学院。

施道比茨所以选择加入科隆和莱比锡大学似乎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一方面, 科隆是德国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 也是其经济、教会和文化中心。这为施道比茨的学业进步提供了很大帮助。例如, 对施道比茨影响巨大的法国属灵作家让·格尔森(Jean Gerson) (1363-1429) 的作品就是在他求学期间于科隆出版的。另一方面, 这两所学校还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中心, 聚集了许多出色的人文主义学者。²¹这些学者对经院哲学展开了猛烈批判。尽管施道比茨本人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 但从他后来对人文主义者的亲近, 以及对经院哲学家们的“争吵神学”(quarrelling theology) 的厌烦来看, 可以肯定, 他深受当时人文主义的影响。

至迟在 1495 年, 施道比茨于慕尼黑加入了奥古斯丁修道院,²²该修道院属于奥古斯丁严守教规派(the strict observers, 也即改革派, 或作谨守派) 的一个分支。施道比茨前往慕尼黑修道院的原因大概有两个,

19 实际上施道比茨本人的讲记手稿均为拉丁语完成, 只是在出版时考虑到布道和传播的需要, 由绍尔(Scheurl) 等人译为德语出版。

20 Lothar zu Dohna & Richard Wetzel, *Johann von Staupitz: Sämtliche Schriften*, (De Gruyter, 1979).

21 如科隆大学的赫尔曼·冯·诺伊纳尔(Hermann von Neuenahr), 以及莱比锡大学的古典学家康拉德·塞尔蒂斯(Conrad Celtis) 以及马丁·波利希·冯·梅勒斯塔德(Martin Pollich von Mellerstad)。后者与施道比茨共同创立了维登贝格大学。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15.

22 施道比茨于慕尼黑加入修道院只是一种可能的推测, 因为他是在这里进行的最后宣誓。参见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19.

一是当时该派领导人安德列·普赖斯（Andreas Proles）²³派他前往那里，以巩固对慕尼黑修道会的改革事业。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慕尼黑修道院的图书馆中收录了大量古代作家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的著作，这对年轻好学的施道比茨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497年，在普赖斯的推荐下，施道比茨前往图宾根大学进一步学习神学。施道比茨很快便取得了圣经学士学位（*Baccalaureus Biblicus*），并在1498–1500年间担任图宾根改革会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教会内部的事务管理与大学的整体作风和思路保持了一致，而后者在整体上倾向于人文主义，并且支持对教会成员进行改革。1499年，施道比茨取得了格言（*Sententiarium*）方面的授课资格，这意味着他可以开课讲授彼得·伦巴德的《四部语录》。

在担任院长期间，施道比茨还致力于推动修道院在学术方面紧跟大学。比如，在他的带领下，修道院也跟随图宾根大学，先后开设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课程用于神学研究。此外，施道比茨还特别鼓励和重视对司格脱的学习。当时图宾根大学的保罗·斯克里普托里斯（*Paulos Scriptoris*）²⁴是司格脱研究的专家，其讲课很受欢迎。施道比茨规定凡他下属的在图宾根的修士必须参加斯克里普托里斯关于司格脱的课程。²⁵这一做法后来也被施道比茨带到了维登贝格大学。

在1497/98年间，施道比茨宣讲了34篇布道，合称为《图宾根布道集》（*Tubingen Sermons*），该讲集是对《约伯记》前两章的注释，其主题是关于上帝的怜悯。

1500年7月6日，施道比茨在图宾根大学接受了神学执照（*licentiate in theology*），以及他的神学博士学位。²⁶

2.2 参与创办维登贝格大学及当选改革派会长

1502年，选侯智者腓特烈决心创立维登贝格大学，在他的邀请下，施道比茨出任神学院的圣经教授以及首任神学院院长。²⁷

按照腓特烈和施道比茨最初的设想，维登贝格将发展成为选侯属地的高等教育中心，其主要作用是为选侯的政府提供适合的行政人员，并为其领地提供医生、律师、教师和牧师等。因此，这所大学最初的主要课程包括，文艺学，教会法和市民法（罗马法），医学，人文主义研究，以及神圣经学（*scared Scriptures*，后来改为神学）。

在办学宗旨上，维登贝格大学主张兼容并包，并尽可能多地容纳各种学派和思想以此来确保自己能够在宗教和学术方面立足。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施道比茨和其他创始者们是沿着人文主义的路线来建立这所大学的。在教学内容上，他们积极推动对圣经和教父们的回归，并且，强调以它们最初的语言，也就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另外在校规方面，施道比茨几乎照搬了图宾根大学的制度规范。例如，在图宾根大学期间，施道比茨发现，这所学校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与修道院之间存在着密切

23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23.

24 他同时也是方济各派的修士，曾呼吁对当时的神学进行改革，因而也被视为宗教改革的先驱之一。

25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4.

26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89.

27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5. 此为一般观点。在林纯洁《马丁·路德年谱》中，认为施道比茨受邀加入维登贝格大学的时间为1503年。见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 *Mading lude nianpu* [Lutheran Chronicles],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17. 另外，根据 Franz Posset 的考证，现存的关于维登贝格大学神学系的记录都晚于1508年，因而怀疑在此之前，施道比茨只是名义上担任院长一职，因为那时神学系的人数还很少。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27.

的教学与活动往来。²⁸施道比茨十分欣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修道会可以成为大学课堂的延申，而他在大学的讲道集也可以作为年轻修士们的学习对象。²⁹因此，他将这一制度也挪进了维登贝格大学。

尽管施道比茨是该校最初的 22 名教授之一，但由于他后来经常忙于教会事务，所以他实际花在教学上面的时间并不多。他对维登贝格大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凭自己当时的声望，成功为这所新学校拉来了许多优秀学生和著名教授。³⁰

1503 年 5 月，施道比茨当选为改革派（也即谨守派或严守教规派）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代理主教（*vicar general*），这是萨克森地区圣奥古斯丁修道院改革会中的最高职位。其主要职责是每年对各个修道院进行访问考察。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施道比茨开始了其长达十年的整合奥古斯丁修道会的计划。

当时德国的奥古斯丁修道会分为两派。一派是非改革派（*non-reformed*），也称康文特修会（*the Conventuals*）。他们分散在 4 个教省，萨克森，莱茵-苏伊士³¹（*Rheno-Suebica*），科隆和巴伐利亚。每个教省每隔三年都有权选举自己的省长（*provincial prior*）。选举完成后要经罗马总会长进行确认方可生效³²。另一派则为改革派。它的存在基础是规定修士们必须严格遵守奥古斯丁修会的教规。此外，它并没有按照教省进行划分，而是综合地管理整个德国地区的全部谨守派修士。与教省一样，改革派也有自己独立的选举权，不过它的选举结果不需要经过罗马教廷的确认。³³

施道比茨的最初计划是寻求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修道院（*the Lombardian Congregation*）结盟，从而创建一个超国家的改革派修道院运动。然而这一计划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受了反对。

1505 年，施道比茨派慕尼黑修道院院长，同时也是其心腹贝斯勒（*Besler*）前往直意大利寻求实现萨克森/德国改革会与伦巴改革会的联盟。但贝斯勒的行动遭到了当时修道会总会长特尔尼（*Agostino Faccioni de Terni*）的反对，后者极其厌恶德国的改革派，并威胁贝斯勒，如果他敢离开罗马，就会将他逐出教会并处以巨额罚款。也是在这一年，年仅 22 岁的马丁·路德加入爱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成为一名见习修士。8 月，在米尔海姆的奥古斯丁修会上，施道比茨也许是从参会的爱尔福特修士那里听说了路德加入教会的事情。³⁴

28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21.

29 David C. Steinmetz, "Hermeneutic and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in Staupitz and the Young Martin Luther,"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70, (1979).

30 例如他在图宾根大学的同窗，同时也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杰罗姆·史尔夫（*Jerome Schurf*）。后者来维登贝格大学后先是教授司格脱，而后又转入法学院，并在那里工作了 45 年。此外还有文学院的首任院长西格斯蒙德·爱普（*Sigismund Epp*），他也是司格脱主义者。

31 中世纪时期，“*Rheno-Suebica*”这个名称指的是德国西南部的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巴伐利亚州（*Bavaria*）以及莱茵兰-普法尔茨州（*Rhineland-Palatinate*）。

32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5.

33 David C. Steinmetz, "Hermeneutic and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in Staupitz and the Young Martin Luther,"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70, (1979), 6.

34 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Mading Lude Nianpu* [Lutheran Chronicles],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0.

1506年，7月3日，³⁵施道比茨视察爱尔福特修道院，首次与马丁·路德见面。这次会见使施道比茨和路德在将圣经作为人的属灵安慰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同时，施道比茨也意识到了路德的巨大潜力。同年秋，施道比茨亲自前往罗马，一是为解救贝斯勒，二为寻求教皇对维登贝格大学的办学许可。

1507年，施道比茨回到慕尼黑。于该年12月15日，在门明根（Memmingen）接到教皇谕令。谕令批准了他联合德国改革派与萨克森及图林根非改革派的计划。³⁶

1508年，在慕尼黑奥古斯丁修会会议上，施道比茨再次当选为代理会长。同年秋，他安排路德从爱尔福特修道院转入维登贝格大学学习。

2.3 试图统一德国的奥古斯丁修道会

在寻求跨国结盟失败后，施道比茨又希望能够统一德语地区的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两个分支，即，康文特修会和改革派。³⁷

在教会内部，他得到了当时罗马改革派新会长，埃吉迪奥（Egidio da Viterbo，亦作 Giles of Viterbo）的支持，后者是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学者和传道人之一。埃吉迪奥与施道比茨有着同样的改革愿望。他建议施道比茨以一种敬虔而平和的方式来逐步推行他们的联合计划。³⁸然而，这一计划再次遭遇反对。反对者出人意料的来自于改革派，因为他们担心非改革派会成为他们的掣肘，拖慢改革派自身的进程。³⁹改革派指责施道比茨的联合计划是在毒害他们，并会让整个教会蒙羞。他们因此向罗马教廷请求独立于施道比茨，要求直接接受来自教廷的管理。

1509年，施道比茨兼任萨克森教省省长。同年，强行合并了科隆的改革派修道院。

1510年，施道比茨再次前往罗马，希望能够得到埃吉迪奥的全面支持。4月，与埃吉迪奥在维泰博（Viterbo）见面，后者答应他会尽力平息发生在德国的争端。然而到5月10日，施道比茨还是迫于压力放弃了对科隆改革派修道院的管辖权。同年6月17日，埃吉迪奥又进一步撤销了施道比茨对施瓦本（Swabia）的五个改革修道院的管辖权，并直接控制了它们。作为一种补偿，几天后，埃吉迪奥书面确认施道比茨现在既是德国改革派的教牧（vicar），也是图林根及萨克森的教省省长。这一任命意味着施道比茨在事实上已经被康文特修会认可。然而联合虽然得到了官方认可，但是仍有一些改革派修士表示强烈反对，其中就包括路德所在的，也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修道院之一——爱尔福特修道院。

根据传统的解释，在这年9月，施道比茨的反对者们派出了路德和另一名修道士一同前往罗马向教皇进行申诉。⁴⁰然而根据最新的研究，路德的此次罗马之行应发生于1511年，并且是由施道比茨本人派

35 根据林纯洁 Lin Chunjie 的说法，此次视察发生在4月3日。见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 *Mading Lude Nianpu* [Lutheran Chronicles],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1。而按照 Franz Posset 的观点，此次视察发生于7月。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50。若按照林氏的说法，则此时路德仍是一名见习修士，尚未完成最后誓言。而若按 Franz Posset 的说法，路德会见施道比茨时已经完成宣誓，成为了一名正式修士。

36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329.

37 *Ibid.*, p.219.

38 *Ibid.*, p.275.

39 *Ibid.*, p.281.

40 此为早期流行的观点，其影响很大。相关论述可参见，Roland H. Bainton,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 (New York: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9), 49; Erik H. Erikson, 《青年路德：一项精神分析与历史的研究》 *Qingnian lude: Yixiang jingshen fenxi yu lishi de yanjiu* [Young Man Luther], 舒跃育 Shu Yueyu & 张继元 Zhang Jiyuan 译, (上海 Shanghai: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24; David C.

他前往，其目的是就发生在德国的争端寻求埃吉迪奥的支持。⁴¹

1511年9月，施道比茨于耶拿召开会议。会议召集了奥古斯丁改革派的修士。尽管参会的大部分修道院都表示支持施道比茨的改革计划，但仍有七所表示反对，其中包括了当时影响力最大的纽伦堡修道院和爱尔福特修道院。

反对派的强硬态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埃吉迪奥威胁他们，如果他们不肯服从的话就要把他们开除教会。然而，此时反对派的领袖西蒙·凯撒（Simon Kayser）却自称为德国改革派会众的会长。他组织反对派再次联名上诉教皇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以抵制施道比茨，但是上诉被驳回。

同年，在施道比茨的帮助下，马丁·路德离开爱尔福特，进入维登贝格。从此定居于此，直至去世。⁴²

也是在这一年，施道比茨建议路德争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接替他在维登贝格大学的《圣经》教习。路德起初拒绝了这一建议，但施道比茨的坚持让他改变了主意。⁴³除路德外，当时还有一位被施道比茨看好的年轻人，即，文策斯劳斯·林克（Wenceslaus Link）。林克也是路德的好友，并且，他还是维登贝格大学的一批学生之一，于1508年获得该校神学博士学位，并于1512年接替施道比茨成为神学院院长。林克与路德都对施道比茨敬爱有加。他们三人都主张属灵的改革，虔诚神学（devotional theology），以及过布道和基督徒的生活。⁴⁴因而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成为彼此的密友，经常互相鼓励。尤其是，在路德因为《九十五条论纲》而深陷宗教改革的漩涡时，是施道比茨与林克顶住各方压力，及时安慰和保护了路德。他们二人也因此付出了极大牺牲。

同年，施道比茨成为路德的忏悔神父。也是在这一时期，路德遭受了严重的属灵困苦（Anfechtung）。此时的路德深受晚期中世纪流行的上帝的义的概念影响，即，基督徒应凭借其善功来赚取恩典。但路德却深感身为罪人的沉重，他在一次进行弥撒时就深感不安，觉得作为罪人的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赢得一个公正严明的上帝的救赎。⁴⁵为此，他甚至对这种上帝的义感到憎恶。基于忏悔和赚取功德这样一种救赎观，路德因此经常事无巨细地向施道比茨进行忏悔。然而施道比茨在这一问题上并不像路德那样敏感而深刻，因而他不能理解路德，只是担心他会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于是对他说：“如果你要忏悔这么多，为什么不去做一些真正值得忏悔的事呢？……别再拿着这些虚假的罪行来这里了！”⁴⁶

该年年底，施道比茨意识到自己的联合计划不可能成功，因而决定放弃。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9;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80.

41 对这一说法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施道比茨派路德前往罗马，但时间仍为1510年9月。采用这一说法的有于可（《路德文集序〈马丁·路德生平〉》，7页），Eric Metaxas, *Martin Luther: The Man Who Rediscovered God and Changed the World*, 154. 而一种较新的解释认为，路德前往罗马的时间是在1511年，也就是在耶拿会议召开之后。见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 *Mading Lude nianpu* [Lutheran Chronicles],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6. 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其理由之一是，按照传统的说法，难以解释路德为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全改变立场，转而支持施道比茨。值得一提的是，Franz Posset 后来也改变了他的观点而支持这一最新解释。见 Franz Posset, *Martin Luther: A Christian between Reforms and Modernity (1517–2017)*, ed. by Alberto Melloni, (Berlin/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17), 173.

42 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 *Mading Lude nianpu* [Lutheran Chronicles],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6.

43 David C. Steinmetz, *Reformers in the Wings: From Geiler von Kaysersberg to Theodore Bez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44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288.

45 张仕颖 Zhang Shiyang, 《马丁·路德称义哲学思想》 *Mading Lude chengyi zhexue sixiang* [Martin Luther and His Philosophy of Justification],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110-116.

46 WA 18. 719; LW 33, 191.

1512年，1月，施道比茨计划为拉姆绍（Ramsau）的修士修建一处新的场所，将他们从偏远的地方转移到附近的贸易中心哈格市（Haag）。其理由是，他认为修士不应该像僧侣一样生活在偏远的修道院，而应生活在城市以便为公民提供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3至4月，于四旬期在萨尔茨堡（Salzburg）完成了他的四旬期布道集。5月，在科隆参加奥古斯丁修道会会议，宣布为了保持改革派的内部统一和完整而放弃联合计划。同时，再次当选改革派的代理主教，他的这一职位一直保持到1520年。路德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当选为维登贝格修道院的副院长，负责管理见习修士。10月，施道比茨出席参加了路德的博士典礼。典礼后不久，他便辞去教职，由路德正式接任。

离开维登贝格之后，施道比茨再次回到了萨尔茨堡。这是一座德国南部的城市，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对改革思想持开明态度。⁴⁷从这一年开始，施道比茨将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布道讲经方面，其活动中心主要在慕尼黑、纽伦堡和萨尔茨堡三座城市。

2.4 布道及援助路德

1515年，施道比茨出版了关于基督徒修行生活的小书，名为《一本关于基督甘愿受死的小书》（*Ein büchlein von der nachfolgung des willigen Sterbens Christi*）。

1516年，于将临期期间在纽伦堡讲道，内容涉及命定论（Predestination），上帝的甜蜜、自由意志、自我训练和人的良知等。该布道引起了当时城中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们的关注。它们被集中编到一本名为《关于永恒预定的执行》的小册子中，并于1517年初在纽伦堡出版。

1517年，于四旬期在纽伦堡进行布道，其中包含了对赎罪券的批评。他宣称，“落入钱箱的金币并不能将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⁴⁸在纽伦堡期间，施道比茨周围还出现了一个“粉丝团”，他们自称是“施道比茨兄弟会”（Satupitz Sodality, *Spdalitas Staupitziana*）。其中一些粉丝和朋友还称自己为施道比茨主义者（Staupitzians）。协会中的成员大多是纽伦堡的政治、文化和教会领袖。这个协会对后来路德作品的发布和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⁴⁹如，在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后，这个协会很快便在内部对其进行了交流，并在数月后将其以拉丁文和当地方言的双语形式出版。珀斯特认为，正是从这一团体中孕育出了后来纽伦堡地区的宗教改革。⁵⁰

同年8月，施道比茨与路德在格里玛修道院见面并讨论了赎罪券的问题。施道比茨告诉路德，官方的赎罪券售卖人泰策尔（Tetzel）正在进行着可疑行为。

该年冬天，受邀前往慕尼黑，以上帝之爱（God's Love）为主题进行了降临期布道。之后，又以该布道为基础，整理出版了《关于上帝的爱》（*On the Love of God, Ein seligs neues Jar von der lieb gottes*）。路德极其喜欢该布道集。他于1518年初，将该书的一个签名副本寄给了自己母亲。同时，他还写信给施道比茨的好友绍尔（Christoph von Scheurl），催促让其尽快再版。在再版的标题页上，路德写道，“一本精彩的指导，由圣奥古斯丁会士，施道比茨博士撰写；圣奥古斯丁会士，马丁·路德博士赞成和推荐。”

47 Robert J. Bast, ed., *The Reformation of Faith in the Context of Late Medieval Theology and Piety*, (Leiden: Brill, 2004).

48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648. 显然，施道比茨的这一说法针对的正是当时售卖赎罪券的宣传语，“钱币叮当一声落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见 Roland H. Bainton,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 (New York: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9), 78.

49 Heiko A. Oberman, *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 tr. by Eileen Walliser-Schwarzbar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3.

50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25.

⁵¹这本书后来也成为施道比茨最著名的作品。在该布道集中，施道比茨指出，上帝的爱和友谊只能通过信仰的眼睛来看，并对当时徒有其表的祈祷形式进行了批评。⁵²

1518年，于四旬期在萨尔茨堡进行布道。主题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受难”。2月3日，收到教皇利奥十世及改革派新会长沃尔塔（Volta）的命令，要求他解决由路德造成的问题。3月31日，与路德通信，肯定他的神学和工作与自己是一致的。路德在回信中称施道比茨为“我亲爱的主内的父”。⁵³

4月25日，邀请路德参加于海德堡召开的奥古斯丁修道会会议。翌日，在施道比茨的安排下，路德发表了著名的《海德堡论纲》。

5月30日，收到路德的一封感谢信，信中，路德表示自己已经走出了悔过（*Poenitentia*）的问题，并热情洋溢地感激施道比茨在这一问题上对他的启发和帮助。路德在信中说，“我开始将您的说法与《圣经》的论说 *poenitentia* 的段落进行了比较。看哪，一个多么最令人愉快的景象啊！《圣经》的话语从各个方面向我跳来，明确地对您的说法微笑着和点着头地加以赞同。它们是如此的支持您的观点，以至于以前在《圣经》里，对我而言几乎没有比 *poenitentia* 更加苦毒的词语了（尽管我热烈地在上帝面前装假病试图对他表达一种假装的和约束的爱），而现在没有什么词语比 *poenitentia* 听起来更加甜蜜和更令我喜悦的了。”⁵⁴

6月，施道比茨宣称，自己已经按照罗马的命令尽了最大努力来解决路德的问题。9月7日，鉴于路德面临的巨大危险，施道比茨致信选侯秘书斯帕拉丁（*Spalatin*），希望他能帮忙坚定选侯保护路德的信心，不要惧怕狮子的吼声，也就是教皇的威胁。同时，施道比茨也在尽力斡旋，阻止任何人，包括教会的和世俗的，将路德带往罗马。

10月13日，施道比茨于奥格斯堡和林克一起陪同路德接受红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的审问。卡耶坦要求施道比茨设法让路德撤回其观点。施道比茨则表示自己已经进行过多次努力，所以他建议卡耶坦自己完成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⁵⁵根据路德的回忆说，卡耶坦扬言要将路德和施道比茨都送进监狱。⁵⁶此外，在这次事件中，出于对奥古斯丁修会以及对路德自身安全的考虑，施道比茨将路德开除了修会，以便他能更自由地行动。

1519年，于四旬期在萨尔茨堡进行布道，主题是关于“上帝的灵在人的灵里的工作”（*God's Spirit at work in the human spirit*）。同年2月及4月，路德写信给施道比茨，抱怨自己目前被身不由己得卷入各种骚动和争论中。他埋怨施道比茨选择待在萨尔茨堡而不是维登贝格，以及很长时间都没有给自己写信。⁵⁷

51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39.

52 *Ibid.*, p.542.

53 *Ibid.*, p.687.

54 这也是被一些学者视为路德的神学突破的时间。见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 *Mading Lude nianpu* [Lutheran Chronicles],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52-55。引文见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著作集》（卷48）*Martin Luther zhuzuoji (juan 48)* [Martin Luther's Works, vol. 48], 黄保罗 Paulos Huang 译, (赫尔辛基 Helsinki: 世界华人路德学会 Shijie huaren lude xuehui [Luther Academy for China, 2024]), 151。

55 Scott H. Hendrix. *Martin Luther Visionary Refor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74.

56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704.

57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著作集》（卷48）*Martin Luther zhuzuoji (juan 48)* [Martin Luther's Works, vol. 48], 黄保罗 Paulos Huang 译, (赫尔辛基 Helsinki: 世界华人路德学会 Shijie huaren lude xuehui [Luther Academy for China, 2024]), 199。

6月，施道比茨缺席了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奥古斯丁修会。会议本想要求他来解决由路德造成的相关问题。此外，当时罗马的改革派会长沃尔塔还曾要求施道比茨成为销售赎罪券的负责人，以便通过这次会议募集资金。

施道比茨的缺席以及他明显的不合作态度激怒了沃尔塔，于是他取消了施道比茨对五所德国南方改革派修道会的管辖权，这一举动几乎抹去了施道比茨对改革派修道会的所有成绩。⁵⁸

6-7月，路德参加了著名的莱比锡会议，并在会议上与经院神学家厄克（Eck）展开论辩。论辩中，路德处于下风，他因为赞同胡斯的观点而被视为异端。会议结束后，路德焦急地表示希望能尽快见到施道比茨。大约是在7月底，施道比茨与路德和林克于格里玛相聚。⁵⁹路德的这两位密友，同时也是当时奥古斯丁修会的领军人物，都坚定地站在路德这边。他们保护路德的方式是，以完全消极的方式来应对来自罗马的谕令，既不抵抗也不配合。从结果来看，这一措施十分有效。

10月，收到路德寄来的《〈加拉太书〉注释》。12月，致信路德说，他们共同的敌人厄克遭到了萨尔茨堡的拒绝。

1520年，3月15日，收到沃尔塔的一封长信，信中告诫施道比茨要纠正他对路德的爱。此外，沃尔塔还透露，他已得知路德将被开除教籍的教皇谕令，因此希望施道比茨能够干预进来，并将路德带回奥古斯丁修院加以管控。然而，施道比茨此时的想法是，宁愿放弃自己耕耘多年的修道会，也不愿牺牲路德。因此，他决心辞去代理主教的职位。

从3月23日开始，施道比茨在圣玛利亚大教堂进行了六次布道。主题关于上帝的爱和人的重生（rebirth），以及效仿基督等。

该年夏，从爱尔福特写信给路德，希望他不要发布其《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但在路德收到此信的时候，该文已经交付给出版社。

7月20日，教皇派厄克到德国宣布教皇的谕令，威胁开除路德教籍。厄克同时还取得授权，在这份名单上又增加了四人。其中，两人来自维登贝格大学；两人来自施道比茨协会。施道比茨此刻显然也处在危险中，因为根据这份教皇谕令，路德的“同伴，庇佑，附庸，以及任何接纳他的人”都要被开除教籍。⁶⁰

8月28日，在艾斯莱本（Eisleben）奥古斯丁修道会上辞去代理主教一职。文策尔·林克继任了这一职位。9月初，与林克一起前往维登贝格看望路德，并请他向教皇写一封信，声明自己从未针对教皇做出任何出于个人的反对。这也是三人的最后一次团聚。同年12月，路德公开焚烧了教皇的书籍。这一行为不仅激化了当前的冲突，而且也给施道比茨造成了巨大压力。他被迫否定路德的立场，甚至被要求公开承认“路德的著述是异端的，错误的，是对虔诚之耳的冒犯……”⁶¹

1521年，1月4日，致信林克，告知其自己当前面临的窘境。其中说，“马丁开始了一些艰难的事情，他非常勇敢，受到了上帝的启发。然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需要牛奶的口吃的孩子。”⁶²然而施道比茨的行动终于还是引起路德的误解。后者认为施道比茨已经屈服于教皇，并于1月14日，致信他说，

58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724.

59 林纯洁认为三人见面的时间大约是在7月16或17日。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 *Mading Lude nianpu* [Lutheran Chronicles],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63.

60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804.

61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817.

62 *Ibid.*, p.817.

“您曾对我说：‘请记住，修士，你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的’。我已经接受这句话，当作不是来自于您的而是通过您而说的，而且我已经从那时开始就坚定地把它记在心里了。因此，我现在以您自己的说法来挑战您”⁶³

3月15日，致信林克，询问维登贝格的信息。并于复活节期间与林克在慕尼黑见面。

2.5 离开奥古斯丁修道院

1522年，4月26日，在教皇的批准下，离开奥古斯丁修院，于萨尔茨堡加入圣本笃会。⁶⁴8月2日，被选为本笃会修道院院长。此事也招致了路德的不满。⁶⁵

1523年，于四旬期为圣彼得教堂的本笃会修女们布道。该布道集于施道比茨去世一年后，由林克代为编辑出版。9月17日，路德再次写信表达他对施道比茨成为本笃会修道院院长一事的不满。他希望后者能够“尽快离开萨尔茨堡修道院”，并与教皇断绝关系。“我们热切地希望并祈祷，您能够从暴君的牢笼之中解脱出来，回到我们的身边，并希望这也是您的意愿。”⁶⁶

1524年，春，于布劳瑙（Braunau）患病。4月1日，施道比茨终于再次致信路德，于信中讨论了宗教誓言的问题。在施道比茨看来，誓言只是通往救赎的一种可行的基督徒的选择，他没有像路德那样将修道院生活和行为的义（work-righteousness）等同起来。⁶⁷此外，施道比茨表示不同意当前的宗教改革路线⁶⁸，并认为路德批评了“许多与正义和信仰无关的外在事物。”⁶⁹尽管如此，施道比茨并没有与路德决裂，而是说，他对路德的爱一如既往，并感谢路德把他们带回了生命的牧场，回到了救赎的话语。⁷⁰这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9月，罗马教廷就阿尔卑斯山的盐矿问题联系施道比茨，要求他从萨尔茨堡派遣几名采矿专家到教皇那里。施道比茨婉拒了这一要求。

12月28日，于巴特赖兴哈尔（Bad Reichenhall）病逝。遗体葬于萨尔茨堡，其墓志铭为：圣经的学生。⁷¹

63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著作集》（卷48）*Mading lude zhuzuoji (juan 48)* [Martin Luther's Works, vol. 48], 黄保罗 Paulos Huang 译, (赫尔辛基 Helsinki: 世界华人路德学会 Shijie huaren lude xuehui [Luther Academy for China, 2024]), 307.

64 一说此事发生在1521年的4月26日。见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12.

65 早在该年6月份，路德就已通过各方消息确认了此事。他于6月27日写给施道比茨的信中说，“尽管我无意于以上帝的意志来介入，然而，因为无知，我仍无法理解你成为一个修道院院长如何会是上帝的意志，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是个明智之举。但是，我不想反对、或说评判你的决定。”
马丁·路德 Mading Lude, 《马丁·路德著作集》（卷49）*Mading lude zhuzuoji (juan49)* [Martin Luther's Works, vol. 49], 赵文 Zhao Wen, 张蕴燕 Zhang Yunyan, 陆臻 Lu Zhen & 韦理惠 Wei Lihui 译, (赫尔辛基 Helsinki: 世界华人路德学会 Shijie huaren lude xuehui [Luther Academy for China], 2024), 109. 在另一封写于1523年9月17日的信中，路德再次满怀忧虑地重复说道：“我也不得不说，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住持，我会更高兴的。但既然你已经这样做了，那就让我们互相体谅，互相理解吧。”LW 49. 48.

66 马丁·路德 Mading Lude, 《马丁·路德著作集》（卷49）*Mading lude zhuzuoji (juan49)* [Martin Luther's Works, vol. 49], 赵文 Zhao Wen, 张蕴燕 Zhang Yunyan, 陆臻 Lu Zhen & 韦理惠 Wei Lihui 译, (赫尔辛基 Helsinki: 世界华人路德学会 Shijie huaren lude xuehui [Luther Academy for China], 2024), 147.

67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965.

68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15.

69 林纯洁 Lin Chunjie, 《马丁·路德年谱》*Mading Lude nianpu* [Lutheran Chronicles],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119.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966.

70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966.

71 Franz Posset, *Luther's Inspirers and Sympathizers From Johann von Staupitz to the Circles of Nuremberg and Augsburg, in A Christian between Reforms and Modernity (1517–2017)*, ed. by Alberto Melloni,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173.

1525年，1月23日，路德写信给施道比茨的侄子分享了这一消息。其中说道，“在独裁统治下遭受了短暂的折磨后，施道比茨离开了人世。”⁷²

2.6 小结

从施道比茨的一生历程来看，无论如何高估其与路德的关系都不为过。然而实际上，施道比茨与路德是两个性格十分不同的人。路德敏感而冲动，并且富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无论是罗马教皇还是德国皇帝都不能让他屈服。他不惧怕任何权威和威胁。在其遗留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大量他与对手的论辩，其言辞之激烈和粗暴往往超乎想象。相比之下，施道比茨要温和克制得多。⁷³性格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施道比茨与路德的外在行为乃至神学观点。⁷⁴例如，尽管在人的罪和上帝的怜悯问题上，施道比茨与路德的观点十分相似，但是他却不太能理解发生于路德身上的那种属灵困苦。此外，身为牧师和传道者，虽然施道比茨也会批判赎罪券和外在的仪礼等，可他很少公开地直接与人论辩。并且，他有时甚至会因外在压力而放弃自己的一些主张，例如他半途而废的联合计划，以及他对教宗的部分妥协。不过这种性格差异显然没有真正影响二人的友谊。实际上，施道比茨本人也十分欣赏路德的勇气，如前述他给林克的书信中所反映的，他为自己的怯懦感到迷茫，称自己为“需要牛奶的口吃的孩子”，而赞扬路德受到上帝的启发，“十分勇敢。”

两人的相似处则在于他们对信仰的纯粹和虔诚。通过对圣经以及早期教父的阐述，施道比茨与路德一样，坚信上帝的爱和基督作为中保。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更具体的论述。

三、施道比茨的主要思想及其与路德的异同

3.1 上帝的恩典与救赎

从图宾根布道开始，上帝的甜蜜就在施道比茨思想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施道比茨看来，上帝是一个慷慨的赐予者，他通过基督将恩典赐予人。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功德（merits）或善功（good works）是无用的。⁷⁵所以在救赎问题上，施道比茨与路德一样，认为人是被动的，如他说，人的救赎始于并在每一个点上都依赖于上帝的拣选。⁷⁶

从这一原则出发，施道比茨实际上重新定义了中世纪以来的称义教义。中世纪的传统是，所谓称义的恩典是使罪人愉悦上帝的恩典。⁷⁷即，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使上帝悦纳，从而获得恩典。这种传统实际上为贝拉基或半贝拉基主义留出了余地，人的行为被强调，善功被认为是获得上帝恩典的必要条件。⁷⁸施道比茨对此进行了一种颠倒。他认为，福音的宣告并不是关于上帝的要求以及罪人满足这一要求的能力，而是关于使罪人认识到他们的无力，并在他们绝望自己无法解脱时前来帮助他们的神圣主动。⁷⁹

72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985.

73 Robert J. Bast, ed., *The Reformation of Faith in the Context of Late Medieval Theology and Piety*, (Leiden: Brill, 2004), 72.

74 Heiko A. Oberman, *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 tr. by Eileen Walliser-Schwarzbar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3.

75 *Ibid.*, p.143.

76 David C. Steinmetz, "Religious Ecstasy in Staupitz and the Young Luth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11, No. 1, (1980), 23-38.

77 David C. Steinmetz, "Religious Ecstasy in Staupitz and the Young Luth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11, No. 1, (1980), 23-38.

78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75.

79 David C. Steinmetz, "Religious Ecstasy in Staupitz and the Young Luth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11, No. 1, (1980), 23-38.

所以，根据施道比茨的观点，不是人通过善功使上帝愉悦（pleasing to God），而是上帝通过恩典愉悦于人（pleasing to human）。⁸⁰但上帝并不是直接地赐予人恩典，而是以基督作为中保，使其承担将义给予人的职责⁸¹。而基督是以其受难完成这一职责的。为此，施道比茨要人沉思基督的受难，以此来感受上帝和基督的甜蜜。他说，“我们所有的苦难和所有疾病都完全与他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并在他的苦难中被克服。我们需要怀着无比的感激来沉思【他的受难】。的确，如果一个人不去沉思他的受难，那他就不会品尝到，一点也不会尝到甜蜜。”⁸²因而在施道比茨这里，称义也就意味着与基督的合一。⁸³

需要注意的是，施道比茨在此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他认为由于罪的缘故，人不可能完全独立，自发而完满地行出善行。实际上，善行是恩典的结果。在图宾根布道集中，施道比茨说，“因为我认识自己，……我无限的不完美；我常常在受苦时感受到，我对你的仁慈判断不正确。因此，我在忏悔中来到你的面前，寻求怜悯和恩典。……事实上，即使一个人在人的后裔中是完美的，但如果他少了来自于你的智慧，那他就不能将不配得尊重。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⁸⁴

所以，按照施道比茨的这一逻辑，实现人与基督的合一，也就是称义，其前提就不是与上帝相似，而是不相似。⁸⁵换言之，与基督合一的人，不应是通过了漫长的属灵修炼或者带着圣洁的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而是一个彻底的罪人。正是因为人的罪使他有资格与基督合一。因为只有“真正的罪人”，一个对自己和为自身的罪而辩护之能力完全绝望的人，才会完全依赖上帝的怜悯。在这一点上，路德完全是属于施道比茨阵营的。正是由于对人自身能力的绝望以及对罪的强调和重视导致路德猛烈地批评了伊拉斯谟的立场。后者淡化了对罪的处理并对人自身的力量充满信心。⁸⁶

总的来说，救赎在施道比茨而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上帝要求罪人在彻底的自我绝望中，将自身外化出去，而这一过程需要律法的帮助。通过上帝的律法，人的灵魂被从其对自我的依赖中撕扯出来。⁸⁷然后，主体与自我（或者说旧我）分化，恩典由此得以作为礼物被接受，进而实现主体与基督的合二为一。这种合一是如此密切，以至于结合后的基督徒甚至可以大胆地宣称“基督就是我”（Christ is I）。⁸⁸这一过程中，施道比茨认为，发生了人的罪和基督的义的交流。⁸⁹他以属灵的婚姻描述了这种交换。通过属灵的婚姻，基督徒分有了基督的义而成为义人，而基督则在此结合中，承担了基督徒的罪和软弱，因而成为罪人。与此同时，施道比茨认为，基督的这种义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它内在于人，是基督通过他的在基督徒中的存在和活动所产生的。

80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86.

81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43.

82 *Ibid.*, p.422.

83 *Ibid.*, p.534.

84 *Ibid.*, p.167.

85 David C. Steinmetz, "Religious Ecstasy in Staupitz and the Young Luth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11, No. 1, (1980), 23-38.

86 迈克尔·艾伦·吉莱斯皮 Michael Allen Gillespie,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Xiandaixing de shenxue qiyuan* [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 张卜天 Zhang Botian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Hunan kexue jishu chubanshe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2019), 212。“亚当的罪使人的意志变得‘微弱但并未消失，受伤但并未杀死，伤残但并未截肢，半死但并未死亡’。因此，如果神给人改变道路的机会，人是能够这样做的，虽然这样做的能力因人而异。”“在《执盾手》中，伊拉斯谟将原罪最小化了。的确，它变得几乎毫不重要。”

87 David C. Steinmetz, "Religious Ecstasy in Staupitz and the Young Luth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11, No. 1, (1980), 23-38.

88 David C. Steinmetz, "Religious Ecstasy in Staupitz and the Young Luther,"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11, No. 1, (1980), 23-38.

89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84.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显然可以看到施道比茨对于路德的巨大影响。在论述属灵的婚姻时，路德这样说道：

信将心灵与基督连合，有如新妇与新郎连合。像保罗所说，因这一个奥秘的连合，基督与人的心灵成了一体。他们既是成了一体，成了真正婚姻的结合……基督满有恩典、生命、救恩；心灵则满有罪恶、死亡、咒诅。让信来到他们中间，于是罪恶、死亡、地狱就属了基督，而恩典、生命、救恩则属了心灵。

90

路德认为，在拥有信心的那一瞬间，基督便立刻入驻到信徒的属灵生命中。此时，作为罪人的“旧我”被基督取代，他真实地“在我们里面”并会“留在我们之中”。从此，信徒活着生命乃是“真实一本体的”“基督自己”⁹¹。

而通过上述引文和分析，在见到二者间的相似性的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二者间的差异。即，路德是以信心作为媒介或说桥梁，建立心灵与基督的关系。而在施道比茨的神学中，他没有格外强调过因信称义这一点。⁹²所以就基督入驻这一问题来看，路德实际上在继承施道比茨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完善。

3.2 上帝的创造和自由意志

施道比茨提出了两种上帝创造世界的原因。

一，上帝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创造世界，但这样做是因为他乐意去创造一些他可以爱，并且他可以与之分享他之所是与他之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世界乃是出于纯粹的善意。创造是一种恩惠。世界也没有在创造的过程中与上帝合作。因此，人作为上帝的造物所获得的一切，都不是基于自己的功绩（merit），而是作为一种礼物，被白白地赐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创造和救赎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两者都依赖于上帝无与伦比的良善。

二，施道比茨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乃是为了让世界赞美他，并在他里面找到最高的满足和最终目标。这一点同时适用于理性和非理性的造物，尽管其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非理性的造物而言，它们赞美上帝的方式是按照其自然的本性朝着上帝创造它的目的而运动。这就是说，对自然中的非理性存在，无论是花开叶落，还是云卷云舒都是赞美上帝的一种方式。尽管这些非理性的存在物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这样做，但在它们朝向创造的目的的运动过程中，上帝得到了赞美，也即，上帝的意志得到了遵循。通过这一观点，我们看到施道比茨赋予了自然界以神圣意义，即在自然的存在中蕴涵着对上帝的赞美。

很难确定施道比茨的这一观点对路德究竟有何种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上帝造物的目的上，路德认同施道比茨的观点，即，创造的目的乃是为反映上帝的奇迹、善良和荣耀。⁹³此外，路德同样认为，在非理性的造物中蕴含着对上帝自身的赞美。在他 1515 年关于《诗篇》的讲座中，路德说：“事实上，

90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路德选集》*Lude xuanji* [Selected Works of Luther], 徐庆誉 Xu Qingyu & 汤清 Tang Qing 译, (北京 Beijing: 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China Religious Cultural Publisher], 2010), 240.

91 曼多马 Tuomo Mannermaa, 《曼多马著作集：芬兰学派马丁·路德新诠释》*Manduoma zhuzuoji: Fenlan xuepai mading lude xinquanshi* [The Works of Tuomo Mannermaa as The Father of Finnish School], 黄保罗 Paulos Huang 译,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55.

92 David C. Steinmetz, *An Essay i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0).

93 Noel F. R. Guzman, *Martin Luther's Ethics of Creation*, (Boston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2006), 157.

一个受造物越是被深刻得认识，就越是能在它里面看到许多奇迹，即，它是多么地充满着上帝的智慧……然而，正如《诗篇》所指出的那样，非理性的受造物并不懂得上帝的作为；它们只是感受到了……”

对于人这一理性的受造物而言，施道比茨保留了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人既可以选择善，遵从上帝的意志，也可以受私欲的裹挟，背离上帝创造他们的目的。⁹⁴

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上，施道比茨认为，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同时一切也都是人类通过同意的自由意志（*consentienter*）。从原则上来说，一切都是上帝的，因为没有他在前的行动，那就没有什么是善的；同时一切也都是人作为上帝的工具（*instrumentaliter*）的自由意志。如果人不赞同神的运动，也就是违背上帝创造的目的，那恩典就不会倾注。⁹⁵在1517年的四旬期布道中，施道比茨再次强调，人被创造为“自由意志”。但是，只有在其行为中依靠上帝的帮助，人才能拥有欣然行善的恩典。⁹⁶

所以，不同于非理性的受造物，人只有在其行为遵循了上帝的意志时，才是真正地赞美上帝。在施道比茨看来，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遵循（同意）上帝的旨意，进而肯定一种（好）行为，而否定其相反的行为。换言之，在属灵事物上，主体不仅有能力判断出是非善恶，而且也可以选择做出符合上帝意志的行为。

在自由意志问题上，路德显然走的更远。事实上，在路德看来，人在属灵问题上完全不具备任何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他说，“我的意见乃是这样：若有人主张自由意志能够作任何属灵的小事，他便是否认了基督。在我的著作中，特别是在驳世上最著名的一个学者伊拉斯谟的著作中，我总是保持着这意见。……我承认人有自由意志。但这自由意志只能在挤牛奶、盖房子等事上有效，不能做比此稍大的事。”⁹⁷路德把人的意志比喻为站在两位骑手——上帝与魔鬼——之间的马。如果它是“由上帝驾驭，它就愿意并实际上按照上帝之意愿前行。”而如果意志是“由魔鬼驾驭，则愿意并实际上按魔鬼的意愿前行。”所以人的意志不能选择骑手，也不能走向骑手；“而是骑手之间相互较量，看由谁来拥有和掌管它。”⁹⁸

最后，总体来看，在上帝创造世界的本质和目的上路德与施道比茨是基本一致的。路德赞同上帝的创造活动是出于纯粹的给予和帮助的观点。⁹⁹但在自由意志问题上，路德比施道比茨更坚定地否决了人文主义的立场，完全舍弃了人的自由意志在属灵问题上的可能性。

3.3 小结

路德曾回忆说，“我对伊拉斯谟无所亏欠。我的一切都来自施道比茨。”¹⁰⁰就其神学思想而言，的确是这样。事实上，在了解了施道比茨的思想后，人们甚至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他与路德的主要差异

94 David C. Steinmetz, *Misericordia Dei. The Theology of Johannes Von Staupitz in its Late Medieval Set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8), 59.

95 Franz Posset, *The Front-Runner of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Johann von Staupi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31.

96 *Ibid.*

97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路德选集》*Lude xuanji* [Selected Works of Luther], 徐庆誉 Xu Qingyu & 汤清 Tang Qing 译, (北京 Beijing: 宗教文化出版社 Zongjiao wenhua chubanshe [China Religious Cultural Publisher], 2010), 531.

98 保罗·阿尔托依兹 Paulos Althaus, 《马丁·路德的神学》*Mading lude de shenxue*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段琦 Duan qi & 孙善玲 Sun shanling 译, (南京 Nanjing: 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 [Yilin Press], 1998), 162.

99 保罗·阿尔托依兹 Paulos Althaus, 《马丁·路德的神学》*Mading lude de shenxue*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段琦 Duan qi & 孙善玲 Sun shanling 译, (南京 Nanjing: 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 [Yilin Press], 1998), 106. “上帝在其存在之深处只是爱；爱是属神的，因为爱就是上帝本身。”“上帝之本性就是只行‘善’。这是他的荣耀；不接受却经常地给予，无偿地给予，不希望感激，不受人对他的态度的影响，即以全然不同于自然的人行善的方式行善。”

100 Carlos M. N. Eire, *Reformations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450–16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2.

在哪里？因为，路德思想中的几乎全部要素都可以追溯到施道比茨。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路德神学的最核心处，也就是“因信称义”入手。

在晚期中世纪流行的是一种主动称义，即，凭借善功来赢得恩典的观念。而施道比茨与路德都持完全被动的称义观，主张上帝的怜悯，白白地赐予以及唯独恩典。然而，“因信称义”在施道比茨的整个思想中始终未被清晰地揭露出来。这种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神学缺陷，即，在基督与人的结合中，缺少了一个可以连接他们彼此的桥梁。也就是，在施道比茨的救赎观中，上帝与人似乎成了两个互相独立的主体，他们之间缺少了一种可以发生联系的媒介。更直白地说，上帝使人称义的合法性理由是什么？在凭善功赢得恩典的救赎论中，这个问题容易回答，因为善功就是上帝使人称义的理由。但当善功这一媒介被拿掉后，答案似乎只剩下上帝白白的恩典，即，没有缘由的，上帝出于自身的爱而使人称义。这正是施道比茨的做法，他将救赎的全部力量都寄托在上帝主动的，全然的爱之中。但由于缺少中间媒介的缘故，人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被救赎的对象，似乎成了一个空洞的摆设，即，他可以脱离于上帝与魔鬼间的争斗，作为独立的三方静候上帝的恩典。为了解决这一理论难题，施道比茨不得不为人的自由意志留出余地。因为只有拥有自由意志的前提下，人才能做出选择遵循上帝旨意的行为，然后才能被灌注恩典。可以看出，自由意志的保留使施道比茨的神学仍带有某种主动称义的色彩。

“因信称义”的提出使路德避免了类似遭遇。在这一问题上，应该说芬兰学派的曼多马揭示地最为深刻。通过对“基督本身就在信之中”的诠释，曼多马明确地把“信”作为联系基督与人的媒介功能揭露出来。在“信”之中，人“真正分享基督的本性及其所包含的神性的生命和胜利”。¹⁰¹换言之，“信”被路德作为人与神连结的通道。¹⁰²藉由信，人与基督不再是两个分割的独立主体，需要一方期待着另一方的善功或是爱，而是在拥有信的同时，人得以与基督真正合为一体。于是，人不再是争斗的旁观者，而是真实地参与基督与魔鬼的争斗，并分享祂的胜利。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按照这个信仰，人与上帝发生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必须作为这个人出现、生存着——即是说，他的虔诚和他的得救的希望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求他的心、他的灵魂在场。”¹⁰³为此，“因信称义”的教义打破了施道比茨式的人与上帝间的隔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仕颖指出说，“所谓上帝白白的恩典并不是一句可以轻松说出口的话。能够说出来的人，必先遭受魔鬼的试探、精神困苦和灵火的试炼，并最终胜过自我，从而战胜罪恶、死亡和世界。”¹⁰⁴

另一方面，通过将意志比喻为马，路德否定了人在救赎问题上的自由意志。因为在路德看来，信本身是上帝的事工和恩赐，其中没有人选择“信”或“不信”的自由意志的空间。¹⁰⁵也就是说，人要么藉着

101 曼多马 Tuomo Mannermaa, 《曼多马著作集：芬兰学派马丁·路德新诠释》*Manduoma zhuzuoji: Fenlan xuepai mading lude xinquanshi* [The Works of Tuomo Mannermaa as The Father of Finnish School], 黄保罗 Paulos Huang 译,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102 赵炜蓉 Zhao Weirong, 《路德的改教发现：因信称义》*Lude de gaijiao faxian: Yin xin chengyi* [Luther's Reformatory Discovery: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Guoxue yu xixue guoji xuek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vol. 24, (2023)。

103 黑格尔 Hegel, 《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 *Zheueshi jiangyanlu* (Disan Juan) [Lectures on Philosophy, vol. III], 贺麟 Helin & 王太庆 Wang Taiqing 译, (上海 Shanghai: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854。

104 张仕颖 Zhang Shiyong, 《马丁·路德称义哲学思想》*Mading lude chengyi zhexue sixiang* [Martin Luther and His Philosophy of Justification],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3。

105 在此，请读者一定不能误解，以为信是另一种形式的善功。实际上，路德认为，信本身也是上帝的恩典。关于信的多重概念以及路德神学中对信的诠释，可参见黄保罗 Paulos Huang, 《信为什么在汉语语境里常被误解？》*Xin weishenme zai hanyu yujing li chang bei wujie* [Why is the term 'Faith' often Misunderstood in Chinese Context?], 《世界宗教研究》*Shijie Zongjiao Yanjiu*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4, (2021), 154。

信，接受上帝之力量的掌握，要么则受魔鬼的力量的掌控，其间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通过否定人的自由意志，路德保持了被动式称义与因信称义之间的一致性。

四、施道比茨的历史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施道比茨，那么马丁·路德绝不会成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那个马丁·路德¹⁰⁶，宗教改革也将因此易弦改辙。因而以路德为界，我们似乎可以将施道比茨对于时代和历史的影响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施道比茨对路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生活上，施道比茨对于路德的人生方向和职业选择起了关键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1511年，施道比茨帮助路德离开爱尔福特修道院，加入维登贝格大学，并在同年劝说他攻取神学博士学位以及成为他的忏悔神父。1512年，施道比茨又安排路德顺利接替了他在维登贝格大学的教职。而路德的这一身份为他赢得维登贝格大学以及选侯智者腓特烈的支持和保护起了关键作用。

此外，在路德身上，施道比茨不仅充分践行了其作为神父的职责，为路德提供了属灵安慰，同时也在改革运动中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保护。1517年之后，作为改革派代理会长的施道比茨被夹在了路德与教皇中间。罗马教廷多次逼他表态，要么解决由路德引发的问题，要么将连他一起惩罚。施道比茨对此采取了一种虚与委蛇的态度，多次利用其代理主教的身份帮助和保护他，直到最终放弃他个人的整个改教事业。

二是在神学思想方面，路德神学中的主要思想，如因信称义，唯独恩典，与基督的属灵婚姻等等，都明显带有施道比茨的影响。其中最为学界所关注，也是施道比茨之于路德的影响中最重要，也最突出的是他对后者所谓神学突破的贡献。¹⁰⁷路德在回顾这一问题时，将自己对忏悔问题的解决全部归功于施道比茨，并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忏悔神学的发明者。¹⁰⁸

其次，是施道比茨在路德之外的历史影响。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施道比茨的影响不仅在于理论层面。从实践方面来看，在担任德国改革派代理主教的前十年里，施道比茨一直致力于推动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尤其是，他试图联合各方势力，推动实现德国改革派和非改革派间的统一。而在担任维登贝格大学神学院院长期间，他则为维登贝格大学招揽来了一批具有人文主义背景的学者，并培养了一批具有良好学识的修士，比如文策斯劳斯·林克。在联合计划失败后，也就是从1512年开始直至其去世，施道比茨几乎每年都会在四旬期与将临期于萨尔茨堡等德国南部城市中进行布道。这些布道吸引了很多德国当时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他们甚至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施道比茨协会。而这个协会在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¹⁰⁶ 如路德说，“假若不是施道比茨博士，我早已沉沦地狱。”Roland H. Bainton,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 (New York: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9), 53.

¹⁰⁷ Heiko A. Oberman, *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 tr. by Eileen Walliser-Schwarzbar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80-181.

¹⁰⁸ Franz Posset, *Luther's Inspirers and Sympathizers From Johann von Staupitz to the Circles of Nuremberg and Augsburg*, in *A Christian between Reforms and Modernity (1517–2017)*, ed. by Alberto Melloni,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7), 177; Heiko A. Oberman, *Luther: Man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 tr. by Eileen Walliser-Schwarzbar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0.

因而无论是从思想史还是社会史角度来看，无论是关于路德还是在路德之外，施道比茨都是一位重要的，值得给予更多关注的神学思想家。

施道比茨生平年表

- 1468? 年 出生于姆特维茨
- 1468? -1483 年 童年和青年时代，与选侯智者腓特烈在格里玛中学就读
- 1483 年 5 月 进入科隆大学
- 1485 年 在莱比锡大学度过一个学期后又回到科隆大学
- 1485 年至 1489 年夏 就读于科隆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
- 1489 年 10 月 加入莱比锡大学文学学院
- 1495 年 于慕尼黑加入奥古斯丁修道院
- 1497 年 前往图宾根大学学校神学
- 1497 至 1498 年 宣讲了图宾根布道集
- 1499 年 获得格言的授课资格
- 1500 年 7 月 6 日 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 1502 年 前往维登贝格，出任维登贝格大学首任神学院院长
- 1503 年 5 月 当选改革派代理奥古斯丁修会代理主教
- 1506 年 7 月 3 日 视察爱尔福特修道院，与路德首次见面
- 1508 年 再次当选改革派代理会长，并将路德从爱尔福特转到维登贝格大学进行学习
- 1509 年 担任萨克森教省省长
- 1510 年 与罗马改革派会长埃吉迪奥于维泰博（Viterbo）会见
- 1511 年 召开耶拿会议，取得了大部分修道会对其改革计划的支持
- 1511 年 劝说路德获取神学学位。成为路德的忏悔神父
- 1512 年 3 月至 4 月 完成萨尔茨堡布道集
- 1512 年 5 月 于科隆奥古斯丁修会上宣布放弃改革派与非改革派的联合计划
- 1512 年 10 月 出席路德博士毕业典礼，并辞去在维登贝格大学的教职
- 1515 年 出版《一本关于基督甘愿受死的小书》。
- 1516 年 将临期于纽伦堡进行布道。
- 1517 年 四旬期于纽伦堡进行布道。出版《关于永恒预定的执行》
- 1517 年 将临期于慕尼黑进行布道。出版《关于上帝的爱》
- 1518 年 于四旬期在萨尔茨堡进行布道。
- 1518 年 4 月 25 日 邀请路德参加于海德堡召开的奥古斯丁修道会会议。
- 1518 年 5 月 30 日 收到路德来信，信中路德表示自己已经解决了悔罪（penance）问题
- 1518 年 10 月 13 日 于奥格斯堡和林克一起陪同路德接受红衣主教卡耶坦的审问
- 1519 年 于四旬期在萨尔茨堡进行布道
- 1519 年 6 月至 7 月 路德参加了著名的莱比锡会议。会后，施道比茨与林克和路德在格里玛相聚。
- 1520 年 3 月 15 日 收到沃尔塔的一封长篇恐吓信，信中威胁将路德开除教籍

1520年8月28日 辞去改革派代理主教一职

1522年4月26日 离开奥古斯丁修院，于萨尔茨堡加入圣本笃会。8月2日，被选为修道院院长

1523年，于四旬期为圣彼得教堂的本笃会修女们布道

1524年4月1日 致信路德

1524年12月28日 于巴特赖兴哈尔（Bad Reichenhall）病逝

The English Title:

The Pioneer of the Reformation—Johann von Staupitz and a Comparison of His Thoughts with Martin Luther's

Meng Yang

Faculty of Protestant Theology, University of Munster. Email: myang2@uni-muenster.de;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7-8916-1538>; Tel: 15501152265.

Abstract: As Martin Luther's mentor and confessor, Johann von Staupitz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artin Luther's life and thought. However, Staupitz's influence on the era and history extended beyond Martin Luther. On an intellectual level, as an important reform thinker, biblical scholar, and pastor, Staupitz reinterpreted the theologies of Paulos and Augustine through his preaching. By emphasizing concepts such as God's mercy, the sweetness of God, Christ as mediator, and grace, he lai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Reformation movement. Practically, as the vicar general of the strict observers, Staupitz initiated integration movements between the reformation and non-reformation. As the founder and first dean of the theological faculty at the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 Staupitz not only attracted many outstanding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to the school but also established the humanist and patristic theological ethos of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 Johann von Staupitz, Martin Luther, the Reformation